

# 國立臺灣博物館 106 年自行研究計畫報告

收藏、保存與傳承再生：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在臺博館

## 摘要

本文首先回顧國立臺灣博物館（臺博館）的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收藏內容，以及收藏的歷史脈絡。並分別從這批藏品作為「民族誌物件」與「博物館收藏」這兩個角度檢討臺博館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收藏的意義。其次，本文將檢討並描述，在進入 21 世紀以後，臺博館如何一方面進行文物清點、數位化與保存維護，另一方面也發展新的策展與合作模式，以促進傳統文物與當代原住民社會的互動。

**關鍵詞：**國立臺灣博物館、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合作策展

## 一、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原住民收藏

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成立於西元 1908 年，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博物之一。日治時期（1895-1945）稱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1945 年後改稱「臺灣省（立）博物館」，1989 年精省後則改稱「國立臺灣博物館」。名稱雖有更動，但收藏的類別仍大體沿續開館時的方向（李子寧，1997；李子寧（編），1999）。

國立臺灣博物館的藏品主要分為四大類：人類學、地學、動物學與植物學（門），藏品總數量至 2015 年共計 115,577 件。其中人類學門<sup>1</sup>典藏品數量共計 41,51 件，其中包括了臺灣歷史、民俗文物 17,703 件、臺灣原住民文物 7,021 件、南洋地區文物 2,383 件、史前考古遺物 9,562 件、世界各國貨幣 4,627 件、北美洲印地安文化文物 171 件，以及「其他類」文物 121 件（如表一）（國立臺灣博物館，2015）。

---

<sup>1</sup> 國立臺灣博物館的收藏研究部門原分為人類學、地學、動物學與植物學四個組，但自民國 95 年 2 月起，館內組織改為研究組、典藏組、展示企畫組、推廣教育組等四組，原有的人類學、地學、動物學與植物學四組改以跨組的「學門」方式運作。

表一：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品數量統計（2015）

人類學		地學		動物學		植物學	
類別	件數	類別	件數	類別	件數	類別	件數
歷史類	17,703	礦石類	2,077	鳥類	3,289	維管束植物類	5,389
原住民類	7,021	貝類	12,523	哺乳類	415	永生植物類	838
南洋類	2,383	魚類	3,081	爬蟲類	1,446	藻類	2,352
考古類	9,562	化石及其他類	2,811	兩棲類	468	苔蘚類	5,206
北美類	171			甲殼類	2,715	玻片類	905
貨幣類	4,627			昆蟲類	23,234	其他類	5,840
其他類	121			植物類	483		
合計	41,581	合計	20,492	合計	32,050	合計	20,530
總計	115,777						

以收藏的時間與方式區分，臺博館的原住民文物收藏有三種主要的來源，分別代表了本館在不同時期，與日本時期臺灣地區其他館的收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來源，就是淵源（或以目前館內正式的用法：接收）自「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時期」（1908~1945）的「蕃族品」收藏。以入藏年代（約自 1900 至 1930

年間)而言,該批文物,數量共計 3,510 件,可說是臺灣目前收藏年代最早的原住民文物。事實上,「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時期」的臺灣原住民文物收藏,依入藏的年代與蒐藏方式而言,又可分為兩個明顯有別的「系統」:「總督府博物館蕃族藏品系統」與「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系統」,分別反映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在不同時期的收藏特色(參見:李子寧、吳佰祿,2003),下表(表二)則列出這兩系統藏品主要內容的對照。

表二:「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原住民藏品的兩個系統對照表

	「總督府博物館蕃族藏品系統」	「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系統」
收藏年代	1908-1915 年	1927-1929 年
藏品數量	(約) 1650 件	1760 件
代表性蒐集者	森丑之助	尾崎秀真
(執行)單位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經費來源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佐久間財團

(本表修訂自李子寧、吳佰祿,2003)

第二批構成臺博館原住民收藏的文物,則是在戰後來自(或以目前館內正式的使用法:移交)於日治時期地方博物館(文物館)的收藏。屬於這種類型的文物共計有兩批,分別為 1949 年間「移交」自日本時期「臺東鄉土館」典藏之原住民文物約 1,300 件,以及在 1964 年間「移交」自日本時期「台中州立教育博物館」之原住民文物計 176 件。前者(「臺東鄉土館」)主要為東部地區原住民的文物,後者(「台中州立教育博物館」)則以中部地區原住民族群文物為主。

構成臺博館原住民收藏的第三類來源,就是在「臺灣省立博物館」時期(1949-1989)以及「國立臺灣博物館」時期(1989 至今)所入藏的原住民文物。總數約近 2,000 件,其主要入藏年代約在 1980 年以後,入藏的方式則以購置(自

收藏家)為主。以上三類原住民藏品來源資料摘要如表三。

表三：臺博館原住民收藏的三種類來源

來源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接收)		日治時期地方博物館 (移交)		臺灣省立博物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
次類別	總督府博物館蕃族品	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	臺東鄉土館	台中州立教育博物館	-
入藏年代	1908-1915年	1927-1929年	1949	1964	1980 以後
藏品數量	(約) 1650件	1760件	約 1,300件	176件	約近 2,000件

以實際的內容來看，臺博館原住民收藏包括了臺灣原住民所有的族群，其中尤以平埔族、泰雅族、排灣族與達悟族的文物最為完整。其年代主要分佈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並輔以二十世紀中期以降若干文化持續或轉型的軌跡。其種類則以日常生活的文物，如服飾、武器、工具、裝飾品為主。總體而言，這些橫跨日治時期與民國時期的原住民文物，構成了堪稱目前臺灣地區歷時最完整、且具歷史意義與研究價值的原住民文物典藏之一。

## 二、臺博館原住民收藏的性質與歷史脈絡

雖經歷不同時期、淵源於不同的來源，臺博館的原住民文物收藏，以整體性質而言，可歸類為「民族誌收藏」(ethnographic collection)。也就是說，這些藏品若非本身是直接產生於某項民族學調查或研究的情境，就是基於類似的旨趣而入藏。另一方面，作為「民族誌收藏」也就意味著，這批文物，有別於「藝術性收藏」，是一種「文化性收藏」。也就是說，它們之所以被收藏成為博

物館的藏品，並不因其外在特徵的美觀或具獨特的藝術價值，而是因其文化上的意義或代表性。也因此，早期這些文物在博物館中多稱之為「標本」，意思就是它們是民族學家或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時所採集的物质文化「樣本」或「物證」(李子寧，2011c)。

其次，作為「民族誌收藏」，除了整體反映出當時收藏者對於「文化」的集體觀念，以及如何進行「文化收藏」的基本假設以外，有些收藏亦可反映出個別收藏者的特殊經歷或特殊關懷。例如，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最早期的一批收藏(即前文所提到在1908-1915年間入藏的「總督府博物館蕃族品」系統)，實際上絕大多數是由日治初期著名的原住民研究者森丑之助在其田野調查過程中所蒐集，因此相當程度反映出森氏本人的調查歷程，理論背景，以及為何、如何收藏的價值判斷。又如，在1920年代末期，總督府博物館入藏一系列關於圓山貝塚、泰雅族珠衣與各種貝類飾物的收藏，可能是源自於尾崎秀真對於臺灣歷史獨特的觀點(參見李子寧，2011b；李子寧(編)，2008)

最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批典藏，特別是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時期的收藏，不只可視為是學術理論的「科學證物」，同時其收藏過程與內容更反映了當時殖民過程與社會觀念。例如，在1927到29年進行的「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不只在短期內蒐集了1千7百多件原住民文物，同時它也是首度以國家力量主導介入而進行的系統性原住民文物蒐集，其背後反映出日本殖民政府對原住民進行「文化治理」的企圖。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忽視背後推動「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另一項動機：「文化搶救」(culture salvage)--在固有文化消失前搶救傳統文物。事實上，不只在1920年代，對原住民進行「文化搶救」一直是推動二十世紀博物館進行原住民文物蒐集的主要動機之一。於今視之，雖然「文化搶救」這個概念與心態本身頗不乏爭議之處，但不可否認的，許多在二十世紀基於「文化搶救」概念所蒐集的臺灣原住民文物，在二十一世紀逐漸「文化資產化」，成為當代原住民重建傳統重要的物質象徵。就此而言，「文化」(至少是一部份)確實是被「搶救」了下來。

### 三、二十世紀末的「典藏危機」與轉機

開館了九十多年，到了二十世紀末，臺博館的典藏亦逐漸浮現一些危機。從各方面看來，臺博館當時面臨的「典藏危機」實肇源於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典藏的硬體。到了 20 世紀末（2000 年），臺博館人類學典藏品總數已近三萬件（29,488 件）（其中原住民類藏品計 5,971 件），但典藏庫房的空間則約只有 200 坪，平均每件文物只有 0.00678 坪的儲存空間。同時，不只空間侷限，相關典藏設施陳舊、環境不良、庫房位置分散，而管理人力更處於歷史新低。這些不利的因素都直接影響了藏品的管理與利用（李子寧，2005b）。

另一方面，除了硬體與人力的不足外，在藏品的「軟體」層面，特別是典藏品的脈絡資料，也逐漸浮現危機。如前所述，有別於一般美術館或收藏古典藝術品的博物館，臺博館的原住民收藏，本質上都可歸類於所謂民族誌藏品。換句話說，這些藏品之所以被收藏，不在於藏品本身所具有的美學或藝術上的價值，而在於它們（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同時，也因為收藏著重的是其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因此藏品的相關記錄（例如它是在哪裡、何時、為何、如何而收的？）就變得格外重要，因為缺乏了這些記錄，藏品所代表地意義就無由追溯。臺博館人類學藏品來源複雜、歷史悠久，更使得藏品相關的記錄難以完整。其中特別嚴重的是，關乎藏品能否充分利用的原始資料也多半付之闕如，尤其在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收藏品的記錄上更呈現嚴重的「斷層」現象。如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成為「臺灣省博物館」，日本時期的標本清冊與記錄不但未能完整的保存，同時在接收時又將所有藏品予以重新編號（參見何勛堯，1999；劉寶璋，1999），因此可以說實質上切斷了這些藏品與日本時期原始記錄間的連結。記錄的斷層，不只造成藏品難以有效地被利用與管理，也相當程度影響對於藏品的研究，李子寧（2005b）即指出，相較於日本時期，省博後期人類學藏品的研究成果已頗有不足，「顯示出人類學組的藏品已越來越疏離、孤立於學術社群」（李子寧，2005b：5）。

面臨世紀末的典藏危機，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臺博館逐步採取相關措施改善典藏的問題。其中重大的措施包括：

（1）**藏品清點**：2002 年 4 月至 12 月，完成人類學組藏品全面性清點（國立臺灣博物館，2005）。本次清點除了完成藏品的數量查核，更重大的意義在於為人類學組藏品資料的內容，進行全面「質」的改善與提升，「將人類學組典藏

品過去滯留在民國 50、60 年代的資料水準，一舉提升至 90 年代之水準」(李子寧，2005b：5)。

(2) **藏品數位化**：自 2003 年起，逐年針對人類學藏品進行數位化，在此所謂的「數位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藏品實體的數位化，也就是藏品影像與資料的數位化；二是對藏品資料的結構性描述，也就是後設資料 (metadata) 的建立。原住民收藏方面，則自 2004 年至 2011 年間在國科會經費支援下完成藏品的數位化工作，並完成臺博館「藏品管理資訊系統」的建置(李子寧，2009a、2009b、2012)。

(3) **藏品保存維護**：同樣自 2003 年起，逐年推動典藏保存維護計畫。包括典藏設施的改善，如現代化庫房的建立。2005 年起陸續建構標準典藏庫房，至 2008 年人類學門庫房已增至 9 間，總面積擴充至 434 坪。另一方面，改善藏品存放環境之外，每年並以專案推動各種藏品維護保存與損傷修護計畫，至 2012 年，完成文物損傷修護 3,499 件，進行文物保存維護 43,556 件/次。

#### 四、從民族誌物件到文化資產：博物館與部落合作策展

進入了 21 世紀，正當在臺博館積極推動各項典藏昇級措施之際，博物館的原住民收藏、人類學知識、與原住民社群間的關係也產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事實上，人類學 (民族學) 在二十世紀 50 年代以後理論興趣的轉向，已使得過去被視為是重要學術資料的人類學標本 (民族誌物件)，幾已成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學術雞肋。人類學與博物館的標本蒐集雖持續進行，但標本作為人類學知識焦點的時代已過去 (除了考古學因其資料的性質，仍持續維持對物質文化的關注) (李子寧，2008)。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降，人類學又重新對博物館收藏的物件燃起興趣。但是在此一重新燃起的興趣中，人類學的標本蒐集被置放在一個更寬廣的歷史背景下，與當時型塑歷史的主要力量，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等觀並視。人類學，特別是博物館的物質標本不只是人類學理論的反映，同時也 and 人類學一樣刻深而多面地捲入殖民的過程中，或強化 (或「物化」) 殖民政府對族群的分類架構，或藉

著對族群「差異性」的強調以建構或鞏固殖民與被殖民者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此一對人類學知識與收藏的歷史角色的反省，也將一個在過去長期隱身幕後且無聲主體—即那些經常被人類學與博物館所描述、解釋與呈現的民族本身—帶入了前台。博物館界、學界不僅檢討過去原住民物質文化收藏與文化展示裡「他者想像」的侷限與片面（李子寧，2005a），同時也積極構思如何將過去缺席的原住民納於博物館物件的詮釋描述，以及展示的過程中。基於上述的體認，臺博館在 2009 年至 2016 年間，分別與五個地方原住民文物館合作，推出七檔以「文物返鄉」為主題的合作型特展，如下表：

表四：臺博館 2009 年至 2016 年的「文物返鄉」特展

展覽名稱	合作展出的原民館	展期
「百年來的等待：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2009/8/1-2010/7/19
「當奇美遇見臺博」特展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2010/10/26-2011/3/13
「驚見泰雅文物—重現在大同」特展	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	2010/10/26-2011/3/13
「遙吟 e-nelja 榮耀 vuvu—獅子鄉文物返鄉」特展	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	2012/11/16-2013/07/05
「vuvu 的衣飾情—國立臺灣博物館及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	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	2013/11/01-2014/04/26
maSpalaw: 臺博館賽夏族文	苗栗縣賽夏族民俗文物館	2014/12/05~2015/06/07



物返鄉特展		
<i>kulumah in</i> 回家了!—臺博館 海端鄉布農族百年文物回 鄉特展	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	2015/12/12~2016/6/12

雖然各有其獨特的合作過程與互動模式（參見：李子寧，2011a；吳明季，2011；吳佰祿，2011；呂孟璠，2011；陳鈺茹，2012），這五檔「文物返鄉」特展仍共享一些共同的特色：（1）都以臺博館藏的原住民文物歸返其「源出社群」（*source community*）為主題，（2）都以臺博館與一座原住民地方性文物館（有時稱為「大館帶小館」）合作的方式進行策展，（3）合作策展的（分工）模式皆依循：由部落族人（至臺博館庫房）進行展品選件，並由部落（或地方原民館）進行展品的詮釋與展示內容的規劃，而臺博館則負責展示設計製作、展品的保護運輸，以及文物佈展的方式而展開。

也不論在合作過程產生多少曲折或波折（參見前引），這些「文物返鄉」特展也使得臺博館得以跳脫出過去單面向的（文化）呈現與「一言堂」式的（文物）詮釋，而營造出一個由國家博物館、地方博物館與地方社群得以互動的場域，在其中參與的各方能以相對平等的方式進行實質與象徵的互動、合作、交換、甚至競爭，不論其最後結果如何，這種（互動）過程本身已是意義豐厚了。

進一步來說，得益於互動過程的或許不只參與的社群及機構，文物本身也可能因之而「受益良多」。一方面，臺博館許多人藏多年，已經「博物館化」的原住民藏品得以藉此契機重新「回鄉充電」。例如，在花蓮奇美族人的「協助鑑識」下，一件原登錄為鄒族的帽子被更正為阿美族奇美部落年齡階級的禮帽（李子寧，2011：8）。而在2012至13年與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館合作策展過程中，一些來自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的文物，不只重新現身在原物所有人的後代眼前，更以他們（文物後人）獨特的視角化為展示的詮釋。

從博物館內「知識的標本」轉為後人眼中的「先人的遺澤」，這個轉變過程不只戲劇化，同時也意義深刻。當然，在實證的意義上，文物（藏品、標本）本

身並沒有改變，它們只是換了一個地方展出。但是，或許在觀者主觀的意識上，這些（返鄉的）文物確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它們從博物館庫房中嚴謹的「民族誌藏品」轉化為如血濃的「文化資產」。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博物館收藏物與當代原住民社會的互動的契機。

## 引用書目

李子寧

- 1997 〈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臺灣省立博物館年刊》40卷：241-274。
- 2005a 〈從殖民收藏到文物回歸一百年來臺灣原住民文物收藏的回顧與反省〉，在：《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慶祝漢寶德館長七秩華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王嵩山主編，頁 23-36，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灣、台中。
- 2005b 〈從清查到修復：國立臺灣博物館人類學組典藏的新定位與再思考〉，在《九十四年度博物館典藏品保存維護規劃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歐陽盛芝、李子寧主編，頁 1-22，國立臺灣博物館，臺灣，台北。
- 2008 〈以博物館為鑑：人類學知識的博物館考察〉，論文發表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主辦之「文物移動與博物館合作」工作坊，民國 97 年 12 月 13 日。
- 2009a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品管理資訊系統的建置與藏品維護管理子系統的使用案例〉，在《文物修護紀錄系統資料庫—文物知識管理研討會論文集》，頁 71-108，國立故宮博物院。發表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數位典藏數位學習國家行科技計畫主辦，「文物修護紀錄系統資料庫—文物知識管理研討會」，2009 年 7 月 23 日。
- 2009b 〈數位化、原住民與博物館收藏—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數位典藏的歷程與反思〉，論文發表於 2009 年 6 月 25~26 日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主辦：「第 2 屆臺灣原住民文化數位典藏研討會」論文集，頁 41-74。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 2011a 〈再訪·「接觸地帶」—記奇美原住民文物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臺灣博物季刊》30(2): 4-13。

2011b 〈展示臺灣史：從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到臺灣省立博物館（1920～1960）〉。在：《博物館展示的景觀》，頁 181-210，王嵩山主編，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2011c 〈理解「民族誌物件」〉。在：《民俗/民族文化的蒐藏與博物館》，頁 96-106，黃貞燕主編，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2012 〈數位化與數位知識的生產：「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的回顧與反省〉。《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3(32): 112-20。

李子寧（編）

1999 《臺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年專刊》，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

2008 《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特展導覽手冊》。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李子寧、吳佰祿

2003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的「再發現」及其意義〉，《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1: 52-75。

呂孟璠

2011 〈文物返鄉與部落詮釋：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在大同特展籌備之我見〉。《臺灣博物季刊》30(2): 28-35。

吳佰祿

2011 〈當奇美遇特展策展面向到臺博：博物館人得期待與焦慮〉。《臺灣博物季刊》30(2): 20-27。

吳明季

2011 〈物的力量：從奇美文物回奇美到恢復失傳祭典儀式〉。《臺灣博物季刊》30(2): 14-19。

陳鈺茹

2012 《文物返鄉與部落詮釋：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在大同特展籌備之我見》。臺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博物館

2005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品清查結果總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2015 《國立臺灣博物館年報》。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